

論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對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鈔》之繼承與刪改*

蔡 定 昌**

提 要

唐宋八大家是文學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名詞，而這八家連稱的確立與反響，有賴於古文選本的流傳與接受。歷代對於唐宋八大家古文選本，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也是確立八大家名稱，以及對後代八大家選本影響最大的一個選本。而清代張伯行也編了一本八大家選本，其名稱竟與茅坤的選本一模一樣，都叫做《唐宋八大家文鈔》，這就很值得玩味了，在眾多的選本中，居然只有張伯行的選本與茅坤本名稱相同，這其中就有很多可以探討的

本文 109.08.14 收稿，110.01.21 審查通過。

* 本文特別感謝鍾志偉教授的指導，以及匿名審查委員的詳細意見，委實讓學生受益良多。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四年級。

DOI:10.29419/SICL.202107_(52).0006

地方了。是以本篇文章從三個面向去討論張本與茅本之區別，首先兩者在編選的標準與目的上都十分不同，茅坤是為了宣揚唐宋派古文，和給考科舉的士子有參考的範本；張伯行則是將此做為傳遞程朱理學思想的手段。再者，對唐宋八大家的看法，兩家對於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的看法基本相同，但在面對曾鞏、王安石與三蘇文時，卻發生很大的歧見。最後，張伯行對於茅坤的評語有很多的意見與批評，甚至刪去了一些茅坤原有的評語。綜合上述之討論，可以肯定張伯行確實是想要取代茅坤選本，而其原因，就在兩人選編目的上有著根本的不同。

關鍵詞：唐宋八大家、張伯行、茅坤、評語比較、文道觀

**The Reception and Revision of *Mao Kun's*
Compiled Transcriptions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A Case Study on Zhang Boxing's *Compiled Transcriptions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Tsai Ting-chang^{*}

Abstract

“The Eight Great Masters’ of Tang and Song” is a crucial term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e best-known anthology of the eight great literary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s essays was collected by Mao Kun which was living in Ming dynasty. During Qing dynasty, Zhang Boxing also compiled *The Eight Literature Masters' Anthologies of Tang and Song*, using the exact same title as Mao Kun’s anthology. This article compares Zhang and Mao’s editions and contains a tripartite discussion of their differences. The first aspect of this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Mao and Zhang’s different compilation standards and purposes. Mao Kun intended to promote his claims about literature,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he Tang-Song school, and give students a model for the Imperial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xaminatio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Zhang Boxing's ideal of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comprehending the whole truth." Furthermore it highlights how Mao and Zhang shared similar views of Han Yu, Liu Zongyuan, and Ouyang Xiu, but was differed in their views of Zeng Gong, Wang Anshi, and the Su family. The final part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Zhang Boxing disagreed with and criticized numerous of Mao Kun's comments, and even deleted some of Mao's remarks. In light of the above discussion, we can see with certainty that, because Zhang Boxing's vis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Dao" opposed Mao Kun's, Zhang therefore hoped that his anthology would replace Mao's.

Keywords: The Eight Great Masters of Tang and Song, Zhang Boxing, Mao Kun, comparison with criticism, concept of writing and Dao

論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對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鈔》之繼承與刪改

蔡 定 昌

一、前言

唐宋八大家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詞，也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幾位古文家，然而這個合稱的出現，其實是經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所醞釀而成的，尤其在明清時期達到了討論高峰：

在中國散文史上，唐宋古文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最能代表唐宋古文斑斕成就，即「唐宋八大家」。這個稱號在南宋醞釀，成形於明代，自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一出，數百年來，無人不曉，有造成明、清以降，不斷有唐宋八大家選本編纂，蔚為跨時代的文學風尚。¹

然而，唐宋八大家這個名稱的確立就是因為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以下簡稱茅本），雖然在當時尚未掀起風潮，不過歷經半世紀的醞釀，唐宋八大家開始

¹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選本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頁1。

得到回響，² 以致後代更多的唐宋古文選本，幾乎都以茅本為參照點將主題圍繞在八大家身上。³ 所以茅《鈔》在古文選本中與散文史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後代選家，若想重新選編唐宋八大家選本，當然會參考茅坤的選本，抑或多或少受到茅本影響。較為有名的，則有呂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蔡方炳《八大家文選》、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秦躍龍《唐宋八大家文選》、陳兆崙《陳太僕批選八家文鈔》、高嵒《唐宋八家鈔》等等如是多之選本。然而這麼多選本中，只有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以下簡稱張本）跟茅坤之選本名稱一模一樣，⁴ 如此看來，張伯行的選本對茅坤選本的繼承性就很高；⁵ 但筆者約略看過後發現，張伯行的選本，

² 付瓊云：「茅《抄》初刊于萬曆七年，此後的半個世紀並不出名……學界對茅《抄》的關注發軔於崇禎時期。崇禎元年，方應祥重刊茅《抄》，指出並訂正了其存在的局部問題。此後的孫慎行、王志堅、吳應箕等人，從不同方面拓展了對茅《抄》的批評。」付瓊：〈簡論明清學人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負面評價〉，《文學評論》第 6 期（2012 年 11 月），頁 126。

³ 吳惠珍云：「《唐宋八大家文鈔》刊行之後，很快就得到迴響，例如陸弘祚所批選的《皇明十大家文選》共 25 卷，收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李維楨、董份、唐順之、王守仁、汪道昆、王慎中、茅坤十家作品，每家各 2 到 4 卷不等，作者之下再分文體，王重民調『其義例全依茅坤批選唐宋八大家方式，故以鹿門為殿也』，此猶其影響之次者，《文鈔》最重要的影響是在於八家之數因此以定，八大家之名因此以立，這點試觀察萬曆以後八家選集漸出便可得到印證。」可見茅坤之《唐宋八大家文鈔》影響之廣且遠也。吳惠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3 年），頁 217。

付瓊云：「崇禎時期距茅《抄》的初刊，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不僅茅《抄》的重刊和書坊的翻刻達於極盛，而且新的八大家選本層出不窮。」

又云：「清代唐宋八大家選本在數量上雖然遠遠超過明代，但從價值取向、編纂體例等更為本質的方面來講，並沒逸出明人選本之外。」

以上皆引自付瓊：〈唐宋八大家選本群的歷史分期〉，《學術論壇》第 8 期（2012 年 8 月），頁 84。

⁴ 據付瓊統計，自茅本後，包括茅本在內，先後共有 59 種以八大家為主的選本，又這些選本中唯獨張本與茅本名稱全同。參見付瓊：〈唐宋八大家選本群的歷史分期〉，頁 80-82。

⁵ 據吳惠珍的說法：「序中雖只說明編書動機，而未指出所根據的原本，但很明顯可以看

與茅坤之選本有很大之不同，雖然所出篇章大多重複，但是張伯行刪去了茅坤本泰半文章，甚至對於選文標準都有不同觀點，與其說是對茅本的繼承，或許更想取而代之，是以筆者希望借助此篇文章，探討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之選文目的，與茅坤本有什麼異同，是為了取而代之，抑或只是一種潮流中的產物呢？⁶

研究方法上，筆者將對於兩者體例、文學看法（以及文學觀）、八大家的評價、文章評點等進行比較，試圖從比較中了解兩者異同。而筆者此篇之意義，正是欲透過兩者差異，了解張伯行的選文標準，與其古文好尚；換句話說，筆者乃欲透過茅本這把鑰匙去窺探張伯行選文內涵與意義。

出此編是由茅坤的《文鈔》而來，因為此編不僅直接沿用茅選書名、體例，凡茅選中所附的八家本傳及刻書引，張氏也大部分直接加以引錄，其他如所選篇目未出茅選範圍，甚至每篇的篇末都附上茅坤原評，都足以證明它是茅選的嫡裔，更足以證明茅選影響之鉅。」張伯行的八家選本確實是繼承茅坤而來的，不過張伯行選文之範圍其實有超過茅坤本，並且在評語上也並未「都附上茅坤原評」，所云稍有舛誤。吳惠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研究》，頁 228。

⁶ 據鍾志偉老師說：「清代張伯行是康熙寵臣，多次得到獎賞，官至禮部尚書。而康熙表彰程朱理學，視為官方正學，遍及天下，張伯行也服膺在性理學說中，因此，他的唐宋八大家選本就有很濃厚的衛道思想。其書也名為《唐宋八大家文鈔》，顯然在繼承之餘，就是要修正茅坤批評的方向。……張伯行把唐宋八家文的價值又拉回思想層面，刻意忽略其文章的藝術技巧，對於唐宋八大家的定位，與理學的宣揚，影響很大。」張伯行就是要修正茅坤的批評方向，筆者十分贊同，是以本篇就是站在這樣的立場，試圖證明張伯行對於茅坤所做的修正。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選本研究》，頁 266。

付瓊云：「清代流行的八大家選本主要是清人的自選本，其中最著名的是儲欣的《唐宋八大家類選》和沈德潛的《唐宋八家文讀本》；清人自編的八大家選本幾乎全部出自康乾時期，可以說康乾時期是繼晚明之後八大家選本衍生與流行的又一個高潮期。」付瓊：〈唐宋八大家選本在明清時期的衍生和流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8 年 7 月），頁 90-91。

二、選本體例與編選理念

首先要比較兩者在體例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編選理念上的差異，這個部分包括選文標準原則，與選文目的，可以說是整部選本的精神架構，也是兩家對於古文的眼光，和他們的文學理論，以及對文與道之看法，是相當重要的部分。而體例上主要比較兩選本對於篇章次序之安排。

（一）選本體例

筆者先從兩選本之章節結構進行比較，發現兩者在體例的安排上幾乎如出一轍：

首先，茅本有〈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唐宋八大家論例〉，放於文鈔之前，說明選文之宗旨與目的，還有對八大家的看法和評論，是全書體現選家文學思想的重要篇章，張本亦有〈原敘〉，而無〈論例〉據吳惠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研究》，茅坤本的〈論例〉是由茅坤的姪輩茅一桂所錄，⁷ 不過並非其姪輩所作，算是茅坤的觀點。但茅坤本來沒有這個部分，算是他人加入，不能算是張伯行對茅本之刪改。

而茅本在各家文鈔前皆有〈引〉和〈本傳〉，這兩個部分會附在前卷之末。而比較特別的是在歐陽修文鈔中分為〈廬陵文鈔〉和〈廬陵史鈔〉，〈史鈔〉前面也有一個〈廬陵史鈔引〉。每一家文鈔，都以文體分門別類，但不依卷次而分類，有些卷目可能有三種文體並存，不過相同的文類還是編排在一起。在八家文鈔的排序上，是韓柳歐王曾三蘇。至於張本，亦有八家〈文鈔引〉、和〈本傳〉，不過張本把這部分全部提到了卷首，也就是把八家〈文鈔引〉、和〈本傳〉全部放

⁷ 此部分請參看吳惠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研究》，頁 97。

到了目錄之前，這是張本不同的地方；張本也沒有選錄〈廬陵史鈔〉的部分，亦是張本不同的地方。而在八家〈文鈔引〉中，張伯行將三蘇文鈔引寫在一起，簡化了茅本分寫三家文鈔的〈文引〉，可能是張伯行對於三蘇的文章比較不重視的原因。又，在文體的排序上，張本雖沒有明確標明出是什麼文體，但是相同文類之文章還是會編排在一起；並且，除了韓愈和曾鞏之文類順序與茅本不同，其他大家之目次幾乎是照著茅坤本的文類順序而編排文章的。可見體例上並不如茅坤嚴謹。而在八家文鈔的排序上，是韓柳歐三蘇曾王，卻與茅坤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張本放入了兩個不同人的序文，而內容都與曾鞏有關，其一是〈羅序〉，另外一篇是茅坤的〈曾文定公文鈔引〉，〈羅序〉是明朝羅倫，江西永峰的一個狀元所寫，其中充滿了道學家的文學思想，他說：「聖賢之學心乎道，非心乎文也，道成於己而文自顯也……文自顯者，文與道為一也。」⁸ 可以看出，張伯行在選錄這則序時，是贊同羅倫的看法，從這裡可以嗅出張伯行理學家的氣味。⁹ 而另外一篇，就是茅坤對於曾鞏文章的看法，這或許是因為張伯行十分重視曾鞏，所以特別鈔錄了茅坤對曾鞏文鈔的評價。〈本傳〉部分，張伯行全鈔茅坤本的〈本傳〉，是承繼了茅坤對唐宋八大家事蹟的看法。

最後附錄表格，以便讀者參考：

⁸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正誼堂全書》影印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原敘，頁4a。

⁹ 「先生學宗程、朱，不參異說。奉『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其實』三言為準的，以聖人之道為必可學，而不可一蹴，幾循序漸進，歷艱險崎嶇，確乎不可拔。以困學自居，退然不自足，檢束考驗，至老不懈誠敬。上結主知，立朝靖獻，一本所學，為理學名臣之冠。」張伯行本係清代有名之理學家，故其文論如此也就無可奇怪。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54。

體例 \ 編者	茅坤	張伯行	備註
原敘	★ ¹⁰	★	
論例	★		
引	★	★	張伯行將三蘇文鈔合寫
本傳	★	★	張伯行直接鈔茅本八家本傳
八家文鈔之排序	韓柳歐王 曾三蘇	韓柳歐三 蘇曾王	主要差異在三蘇曾王
〈羅序〉		★	表現出張伯行理學家的特質
〈曾文定公文鈔引〉		★	表現出張伯行對曾鞏的重視

總體來說，茅本與張本在體例上變化不大，然而更突出的是在其選文的數量與篇目的差別上，尤其在曾鞏文鈔的數目上特別顯著。

（二）選文之標準與目的

一部選本所收錄的文章，必然是經過選家所肯定的文章，更是符合其文學理論的文章，從選家所選的文章可以歸納其選文，看出其文學偏好。然而，這兩部選本都在開頭明確說明他們選文的標準和目的，方便讀者理解他們的文學觀和對文章藝術性的看法。¹¹ 筆者從他們的自述中，能夠比較兩選本選文標準和目的，並從中歸納其對古文與文學之看法。

¹⁰ ★號代表有此體例。

¹¹ 鍾志偉老師也認為從序文和編纂體例觀察選家之選錄標準是主要方法。參看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選本研究》，頁 78。

1. 標準

茅坤在其〈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中引用權威性的話作為好文章的標準，這也可以視為茅坤選文標準：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為文者之至也。¹²

茅坤論文之總綱領，就是「其旨遠，其辭文」，茅坤以孔子的話作為權威性的評文標準，這就使其他人無從批評茅坤的選文標準，而茅坤也發揮這段話說：

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¹³

茅坤以為「其旨遠」就是與道不相悖；「其辭文」就是展顯道之燦然面貌，就如讖緯之輔助於經那樣，亦合於人文之統，不可廢也！由此茅坤對於選文的標準是「不悖於道，展顯道之燦然」，這樣的標準顯得寬鬆許多；是以茅坤在序中說到：

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為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藝之遺，則共為家習而戶眇之者也……如所云，則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簠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

¹² 明·茅坤：〈原敘〉，《唐宋八大家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四庫文學總集選刊影印欽定《四庫全書》本），頁1383-13。

¹³ 同前註，頁1383-14。

皆駢枝也已。¹⁴

茅坤於此處表示了他選文標準之寬泛，只要是符合「孔子六藝之遺」就可以選錄，不一定要像「太羹玄酒」這樣的文字才能學習。甚至他在〈原敘〉最後，更將選文標準放寬：

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掲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盪已。¹⁵

在此茅坤只能保證他所選文與「道不相盪」而已，所以茅坤在選擇文章上的標準主要就是與道不相悖，即不悖於六藝之旨。

而在張伯行看來寫文章是為了立言，他說：

是以文章一道，近於古之所謂立言者，而盛衰升降，亦同源異流，不可勝紀。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¹⁶

文章之本於六經，六經乃治世之文，故張伯行對於文章的標準不只在本於六經，更需要有積極的治世之用：

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為難；其得稱為大家，抑尤難也！是故巧言麗辭以為工者，非大家也；鈎章棘句以為奧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駢四儷六，以為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為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偉俊，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決江河而下也；高可以

¹⁴ 同前註。

¹⁵ 同前註。

¹⁶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頁1a。

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¹⁷

這裡張伯行更申說其旨，他明確的表示了對於大家之文的看法；非是在文章的形式上工整，更不是華美、好奇炫博的；而是詞簡意精，能上下天地、高佐六經之文章，更重要的是「顯足以周當世之務」。如此可以看出茅坤與張伯行都認為為文需本於六經，也就是本於道，可是兩者在細節上卻有很大的分歧。張伯行是更看重文章的實用性，他覺得好的文章就是治世之文；而茅坤則以為只要不悖於道就行，甚至選了一些所謂的駢儷之文，¹⁸ 可見兩者在標準上是一緊一鬆，甚至可以發現兩者對於「好文章」有不一樣的看法。¹⁹

2. 目的

茅坤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有幾點目的：

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輳，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豈不堪淫滌濫，而互相剝裂已乎！

¹⁷ 同前註，頁 1b-2a。

¹⁸ 「四六文字予初不欲錄，然歐陽公之婉麗，蘇子瞻之悲慨，王荊公之深刺，於君臣上下之間似有感動處，故錄而存之。」此段見於其序。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3-15。

¹⁹ 據統計，張本：「選錄韓愈文 3 卷 60 篇，柳宗元文 1 卷 18 篇，歐陽修文 2 卷 38 篇，蘇洵文 1 卷 2 篇，蘇軾文 1 卷 26 篇，蘇轍文 2 卷 27 篇，曾鞏文 7 卷 128 篇，王安石文 2 卷 17 篇，合計 19 卷 316 篇。」蕭瑞峰：〈張伯行與《唐宋八大家文鈔》〉，《古典文學知識》第 4 期（1995 年 7 月），頁 99。曾鞏文數量大幅超越其他家的選文；如果與茅鈔相比，則更能突顯其差異：「茅坤認為八大家之中，營鞏的成就最小、歐陽終的成就最大。根據萬曆七年初刻本所收的八大家篇數可以知道，曾文倒數第二，不足總篇數的 7%，歐陽文最多，超出了總篇數的 20%。而張伯行則完全相反：張選共收 281 篇，其中曾文 128 篇，占 46%，歐陽文 19 篇，不足 7%。」付瓊：〈唐宋八大家選本與明清文學教育的適配〉，《天府新論》第 5 期（2008 年 9 月），頁 142。可知兩者對文章之審美觀點不盡相同，尤其在曾鞏文上特別明顯。

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為批評之，以為操觚者之券。²⁰

首先茅坤是明朝古文家中的唐宋派，相對於李夢陽所領導的復古派。然而，唐宋派之興起與復古派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究言之，乃是復古派的末流出現了十分嚴重的弊病，這點可以從唐宋派成員之文字中看出：

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鉅釘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闢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倨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²¹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由李夢陽等所領導的復古派，在後來開始出現一些模仿古文外型，而無古文內容的文章。因此唐宋派在這樣的情況下另立門戶，主張以唐宋古文為主要學習對象，而其理由則是因為唐宋古文有法可循，不如秦漢古文之無跡可求。這點還是唐順之說的最透徹：

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

²⁰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3-14。

²¹ 明·唐順之：〈董中峯侍郎文集序〉，《重刊荊川先生文集》（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掃描《四部叢刊初編》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萬曆元年[1573]重刊本），卷 10，35b-36a 頁。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8943&page=155> 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25 日。

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²²

也就是說，作文之法古今不同，可是其背後自然而成的作文之法，卻是古今不異的。再者，秦漢文章渾然天成，是以法密而不可窺；唐宋古文嚴守其法，雖言而可學，是以欲以唐宋古文上窺秦漢作文之法，其派論點主要在此。

另外一個重要分際，則是復古派重「形式」，唐宋派重「精神」，這點當然是以兩派大趨向而論，復古派固然有云古文精神，然比重不高，末流弊端甚多，徒摩形式，是以王慎中云：

方洲嘗述交游中語云：『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曾，不若學馬遷、班固』，不知學馬遷莫如歐，學班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學馬、班，豈謂學歐、曾哉？但其所學非今人，所謂學今人，何嘗學馬、班，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漢全文，其餘文句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寒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²³

茅坤對於「神」亦有其獨特見解，其云：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所當怒而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淒然弔且賦者，或耗焉未

²² 明·唐順之：〈董中峯侍郎文集序〉，《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10，頁35。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8943&page=155> 檢索日期：2021年7月25日。

²³ 明·王慎中：〈寄道原弟書八〉，《遵巖集》（CADAL 掃描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43年[1778]，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卷25，頁33b。網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06076592.cn/page/n152/mode/2up> 檢索日期：2021年7月25日。

之及也。²⁴

這段文字，茅坤講述他對於寫作古文心得之看法，認為一般學士在學習《史記》筆法時，只學了外在形式的皮毛，其中深刻的情感內涵，卻沒有描繪出來。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才編選了這部選本，目的就是為了宣揚唐宋派文學理念。茅坤在文鈔中選錄了許多唐順之、王慎中的評語，這兩位都是唐宋派重要人物，是以選錄他們的評語，足見茅坤選編此書對於唐宋派推廣之重要性，與目的性。²⁵

另一個目的是提供舉業學子一個學習範本：

蘇明允《易》、《詩》、《書》、《禮》、《樂》論未免雜之以曲見，特其文道勁；子瞻〈大悲閣〉等記及〈贊羅漢〉等文，似狃於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見解超朗其間，又有文旨不遠，稍近舉子業者，故並錄之。²⁶

「文旨不遠稍近舉業」，特其選文一大目的，文旨不遠跟其選文標準有關，但是選擇文旨不遠之文章，乃欲資舉業者學文之用，則為其目的所在。²⁷

²⁴ 明·茅坤：〈刻史記鈔引〉，《茅鹿門先生文集》（CADAL 掃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重刊嘉靖刻本，約西元 16 世紀），卷 31，頁 6b。網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s/02100445.cn/page/n72/mode/2up> 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25 日。

²⁵ 吳小林云：「唐順之編選《文編》，茅坤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都是為了推廣「八大家」的古文。茅坤評點「八家」文，對揭示「八家」文的寫作技巧也有一定的價值。他們還針對前後七子的因襲模擬，強調學習前人的精神命脈，主張寫文章要有真知灼見，要從自己胸中流出，並倡言「風神」，追求生動傳神，委婉含蓄的審美境界。這些主張和做法，對普及唐宋優秀古文，維護「八大家」的優良傳統，反對擬古主義的逆流，起了積極作用。」吳小林：《唐宋八大家》（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頁 385。

²⁶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3-15。

²⁷ 清代選家儲欣即云：「雖然嘗即其選與其所評論以窺其所用心，大抵為經義計耳。其標間架、喜排疊，若曰：此可悟經義之章法也；其貶深晦、抑生造，若曰：此可杜經義之語累也；其美跌宕、尚姿態，若曰：此可助經義之聲色也。經義以闡聖賢之微言，諸大家之文以佐之經義，所以之書一出，天下向風，歷二百年至於梨棗腐敗，而猶購讀不已，有以也。」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清·康熙間刻本，哈佛燕京圖

至於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的選文目的則十分明確：

余故選其文而論之，不特以資學者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即於此乎在。²⁸

「窮理格物」，這是從宋明理學，尤其是朱子學一派繼承而來的窮理格物之工夫修養，也就是透過讀書來認識、接近道體——理。²⁹ 不過張伯行之所以對於格物窮理如此重視，乃是因於當時清朝康熙時代對程朱理學的重視，而這等重視又是因於士人將明末王學末流與明亡的慘痛經驗相聯繫，認為明亡的原因之一在於心學之傳播，是以特別重視程朱理學，並與王學攻訐。張麗珠在《清代義理學新貌》中說：

明亡於清的慘痛經驗，仍在儒者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傷痛；而王學末流的流弊，又正在於決堤防、破崖岸、恣肆傲物；再加上清帝力持程朱理學立場，凡此都使得陸王一派在清初受到很大的打擊。³⁰

然而陸王學派並沒有因此完全消弭，程朱理學與心學之爭一直都在進行，並且

書館藏本，約 1705 年），總序，頁 2a-2b。

清代儲欣所云，正點出茅本對舉業之重視，而造成其流行之結果。

²⁸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頁 2b。

²⁹ 朱熹對於格物窮理有許多論述，筆者錄其一二，以見其概。

「朱子曰：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週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又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陳榮捷著：《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181。

³⁰ 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頁 83。

始終沒有一方能完全壓倒另一方的時候。張麗珠云：

在清廷羽翼朱學之劣勢下，藉著揭破程朱學統中先天太極說之援引道教事實，以駁斥程朱學統所自詡的道統之正、聖學之傳……各種學術仍蓬勃地發展著，並沒有受到扼制與壓抑。³¹

就是在這樣理學與心學之爭中，張伯行以發揚程朱學為己任，並駁斥心學，其〈性理正宗序〉云：

金谿之學熾甚，以為即心是理，六經皆我註腳，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空洞無涯之識，而昧然於天理之真，學者樂其簡便而易從也，於是矯誣聖賢，捐棄墳典，逞其擎拳豎拂之餘智，猖狂叫呶，猶自擬於聖人之尊德性。若非紫陽朱子反覆辨難，大聲疾呼，比之為告子，又直斥之曰禪，其為正路之荊榛，入門之障蔽，寧有紀極耶！³²

可見張伯行對於程朱學的讚揚與傳承。是以張伯行在編纂《唐宋八大家文鈔》時，當然也以程朱學為依歸的。反觀茅坤的《文鈔》，是在文學主張爭論下產生的產物；張本則是在朱王學派相爭的環境裡誕生的。兩者在編纂時的前理解就不同，目的自然也不相同，然而有一點相通的，則是提供學子學習作文目的上是一樣。只是強調應學何種文章，學習文章的目的為何？卻又有所不同。張伯行正欲透過理學家格物致知的脈絡來論文，所以張伯行選編這部選集的目的，雖然也欲使舉業者有範本可以參照，但更希望學文者能透過此書去格物窮理，認識

³¹ 同前註，頁 84。

³² 清·張伯行：〈性理正宗序〉，《正誼堂續集》（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正誼堂全書》影印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卷 4，頁 10。

文章背後的道體。³³

整體來說，張伯行編選之標準除了與茅坤大不同外，更與茅坤的目的不同，茅坤的目的是在宣揚唐宋派文論，以及使舉子業者能有學文之典範；張伯行則特在格物窮理上去看文。是以茅坤更多從寫文章的角度上去看文；而張伯行更多的從「道」、「理」上去評文。

（三）兩選本對文與道之看法

茅坤認為最好的文章，應該是「其旨遠，其辭文」，但是能夠到達這樣標準的人並不多，並且茅坤認為文與道是一體的：

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³⁴

茅坤把文道相結合，文幾乎等同於道的展現，但又有寫得好不好的問題，這個問題，茅坤把它歸結到對於學作文章是否專心一志，主要還是回到「其旨遠」、「其辭文」上面，只要符合這兩個要求，文與道是不分的。而在茅坤看來，文章之文彩，正是道展現其光輝之燦爛。³⁵

³³ 張江藩：「認為文章應該符合道統的價值標準，審視其思想內容的醇正與否，因此「立言部」的另一用意在於「不特以資作文之用」，以糾正當時科舉功利重辭章技巧之病，希望學子以義理思想為重，明白文章為道學之枝葉，突顯理學家對儒學的義理內涵更重於文人作品的辭章技巧。」張江藩：《張伯行經世實學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所碩士論文，2010年），頁138。此論述與筆者之意接近。

³⁴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14。

³⁵ 而茅坤似又特重於文統之發展，茅坤於古文特別強調文統性，認為只要有人「得其解」就能繼承六藝之旨：「僕之私竊以秦漢來文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其傳而獨振者，惟史遷、劉向、班掾、韓、柳、歐、蘇、曾、王數君子為最，何者？以彼獨得其解故也；解者，即佛氏傳燈之派（派），彼所謂獨見性宗是也。」明·茅坤：〈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茅鹿門先生文集》，卷4，頁3a。網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02100432.cn/page/n60/mode/2up> 檢索日期：2021年7月25日。

在張伯行的觀念，文學亦是孔門四科中之概念，然其云文章，正可以看作他的文學觀點；首先張伯行認為文章與立言有關，又立言之道在後來分化成文學，三者相關而有別：

古之所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言、立功。是三者果可分而視之哉？夫惟古之聖賢，本其德而垂諸言，以為功於萬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能兼事三者而有之，六經、四子之書是也。自孔門設教分為四科，有以德行稱者，有以言語、政事、文學稱者。群弟子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至於後世，源遠而流益分，則三者之各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不能兼亦宜矣。是以文章一道，近於古之所謂立言者，而盛衰升降，亦同源異流，不可勝紀。³⁶

基本上，認為文章是從儒家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中的立言而衍生出來的，但是因為後代的一些流行變化，使得文章之道開始複雜盛衰：

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為難；其得稱為大家，抑尤難也！……其詞簡質

而得其解是何意思？茅坤沒有多加說明，唯茅坤以禪宗為喻，認為與之相同，然禪宗傳法，非靠文字，茅坤比喻有些失當。然茅坤之意當是認為六藝經傳有其深旨，能得其解，即得其文統之傳。這點在其〈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中亦可明顯看出：「僕昨所云作者之旨，蓋以古之作者譬之佛氏之禪燈一脈也。」

本朝詩聲自弘治、正德以來，度越宋元直逼唐風矣。文章一派，猶未得其至者。僕嘗作一文旨，以貽許海嶽、沈虹臺二太史，大略以為文必溯六藝之深，而折衷於道，斯則天下者之正統也。……近代如唐司諫所裒《文編》，亦或沿其遺意而為之者。……而僕所以嘖嘖焉，絮聞於兄者，憫國家二百年而猶未見文之赤幟……」明·茅坤：〈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茅鹿門先生文集》，卷4，頁11a-11b。網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02100432.cn/page/n76/mode/2up> 檢索日期：2021年7月25日。

這篇文章依然本著傳燈的概念，並且進一步說明了，所謂宗旨，正是六經之旨，且能得其姊者，乃是正統。又茅坤云唐順之的《文編》，是沿著正統的遺義而來的，那麼《文鈔》的編纂就不只是給士人學子學文那麼簡單的目的，更有茅坤欲伸彰正統，繼承文統的志向了。

³⁶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頁1a。

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決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³⁷

這裡講到張伯行認為大家之文應該有的氣象，主要講氣、意、法、詞，各有不同要求。然而最後還是以六經為最高標準，只要能寫得跟六經差不多好，那作文功力就非常高，並且還能周濟當世之事務，就算大家之文。張伯行認為文學的標準應本六經，文學的用途則是濟世：³⁸

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也，本道而發為文也。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而離合醇疵之故，亦遂行於文而不可掩。³⁹

從這裡可以看出張伯行認為文學只是道的工具，道才是應該重視的，文是本於道的。又文人的文章，還是可以見道。不過，雖然他們文章寫得很好，用道來斟酌判斷，還是可以發現缺點。可見張伯行對文章的最高標準，還是要合於道的：⁴⁰

³⁷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頁 1b-2a。

³⁸ 張伯行對於讀書的目的是有用於世的觀念，還有很大部分顯示在其文集中，如：「凡用世之道所宜深究，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看他氣象是何等弘毅。今之，時藝之外，茫然無知，微倖一第，出宰民社，凡兵刑、錢穀、農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務，可修可舉者，毫無定見，不得不聽命於奸胥猾吏。在我不能操其柄，則居官僅以守府耳。今諸生未第時，乘此餘閒，即當留心世務，淹貫博通，務在有裨實用，可以坐言起行，則今日草茅所論，定即異日之嘉謨碩畫也。事孰有切於此者，故為爾諸生次及之。」清·張伯行：〈紫陽書院示書生〉，《正誼堂文集》（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正誼堂全書》影印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卷 12，頁 18-2。

³⁹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頁 2a。

⁴⁰ 張伯行對於文道的觀念，主要還是受到程朱理學之影響，而張伯行本身就對於程朱理學的推廣不遺餘力，其在福建作官時，曾建書院、興文教，並云：「文公朱夫子，閩產也，羽翼經書，闡明濂、洛，接鄒、魯之緒，集羣儒之成，其所以流衍道脈，垂範後人者，厥功鉅矣。」清·張伯行：〈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正誼堂續集》，卷 6，頁 5。由此可見其讚揚推廣之心。

此數公者，其離合醇疵，各有分數，又不可不審擇明辨於其間，而概以其立言而不朽者，遂以為至也。⁴¹

看大家之文還是要辨明其中的醇疵，而八大家其實就是做到立言不朽，所以才認為他們的文章幾近至上境地。

由此可以發現，茅坤對文學的看法，在標準上是比較寬泛的，雖然也認為文與道相盛衰，但並不否定文章之工，也不否定修飾文章，甚至認為對於文章之修飾，就是道之燦爛。大大肯定文章本身之藝術性與文學性。相較之下，張伯行對於文章就不那麼重視，認為文章無非是道體的枝葉，道為本，文為末；張伯行想認識的是文章背後的道，而非文章本身之藝術價值；因此對張伯行來說，文章寫得好，乃是在內容上呈顯於道，因道以成文，乃是一種對道的表述，若能傳之後世，就做到了立言不朽。這是張伯行認為八大家了不起的地方，完全是站在儒家立場去討論文章之好壞、與價值，並否定文學與藝術價值對文章的重要性。這是兩位評家對文章看法之根本不同。⁴²

至於文道之看法，程頤回答作文是否有害時說：「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宋·程頤著，清·張伯行選錄：〈遺書伊川先生語〉，《二程語錄》（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正誼堂全書》影印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卷11，頁1。此條目又經張伯行選錄，可以說就是張伯行同意的說法。

而張伯行在〈原序〉中又引《朱子語類》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可知其對於文道之關係，乃是上承程朱理學而來的。

同樣是《朱子語類》，其載：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朱子）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39，頁3305。

以上可知其文道觀所本於程朱，以及理學之文道觀乃是重道輕文。

⁴¹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頁2b。

⁴² 說穿了，張伯行對於作文，是以工具概念來看待，也就是必須透過這個工具來展現個人的思想內涵與道德精神。

換言之，茅坤強調「旨遠辭文」而張伯行則強調「立言不朽」，兩個人雖然都認為六經是寫作文章的最高典範，也認為文章可以呈顯出道，但是側重點不同。茅坤還是以「旨遠辭文」作為最高標準，實際上卻是以舉業習文為主，雖然立意高遠，卻做不太到。反觀張伯行，文章不過是道的枝葉，是為了把握背後的道才去看文作文的。創作文章本身也是為立言垂諸萬世之功的，更為傳道而作積極濟世之用，簡而言之，茅坤是從文章應該如何創作上去看，張伯行則是從目的與功用上去著想，故基本上即十分不同，茅坤雖然與張伯行之文學觀念不同，可是正因為茅坤還是以六經為文章之本，觀念上與張伯行，亦有相通處，才會被張伯行所認同，而以茅本作刪改。

三、兩選本對唐宋八大家的看法

（一）韓愈

茅坤認為韓愈「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司馬遷、劉向、揚雄……而揣摩之」，⁴³ 這是茅坤認為韓愈所繼承的古文傳統；又說「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⁴⁴ 這是讚揚韓愈對古文之功。張伯行對此也是贊同的「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⁴⁵ 不過茅坤認為韓愈所學包括揚雄，張伯行對此態度保留，甚至認為學揚雄是不對的，這在分析兩者評點時會再細講：

此外，茅坤對韓愈的文章風格有很多論述，如在〈論例〉中說：

⁴³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17。

⁴⁴ 同前註。

⁴⁵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韓文引》，頁7a。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道逸，予間亦鐫記其旁。⁴⁶

又說：

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為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搯抉，幅尺峻而韻折少也。⁴⁷ 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摩西來獨開禪宗矣。⁴⁸

明顯從韓愈特定文體與其風格特色，評價韓愈文章；若以文體評之，則碑誌最為奇特，但不得史漢筆法，尤為陡峭，蓋因其文氣不平，敘事峻切少韻致曲折處，而書記序辯之類，茅坤認為是韓愈的獨門絕學，且像達摩祖師另啟一派門戶。

張伯行大量引用韓愈自己的文章內容，介紹韓愈何以為文，其云：「然讀其文而不知其所以為文，雖徒仰之何益？」⁴⁹ 所以引了很多韓愈論文之文：

公固自言之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是其學為文之心也。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是其養乎文之道也。曰：「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是其積之厚以為文之本也。曰：「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所以盡乎文之妙也。曰：「能自樹立不因循。」是所以提綱挈要，教人為文之法也。蓋公所以為文者，盡乎公所自言者矣。⁵⁰

⁴⁶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3-15。

⁴⁷ 此蓋言韓愈文章在尺幅間呈現一種峻峭之勢，可是少韻致曲折之感。

⁴⁸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3-17。

⁴⁹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韓文引》，頁 7a。

⁵⁰ 同前註，頁 7a-7b。

與茅坤不同的是，張伯行特從韓愈「所以為文」去論述；張伯行認為韓愈「為文之心」正是要「存聖人之志」；而「沈潛乎訓義」，也是要「積之厚以為文之本也」，這裡不只看出韓愈為文之法，亦可看出張伯行認為作文應有的涵養。所以張伯行最後說「後之學者，毋徒讀公之文，當知公所以為文者。於公之言深味之，無患乎趨向之不正矣」⁵¹，正要學者在為文上心於聖、本於道，這就是張伯行認為「聖賢非有意於文也，本道而發為文也。」⁵²的觀點。張伯行與茅坤對於韓愈文所重不同，茅以文學；張以涵養也。

（二）柳宗元

茅坤認為柳宗元的文章，最好的為議論文，及山水文；至於墓誌碑碣則有六朝遺風，故不錄。且認為遭貶永州司馬後，作品較為可讀。⁵³張伯行則不談柳宗元文體優劣，直接對比韓、柳文，與韓柳讀書法。其曰：「唐世文章稱韓、柳，柳非韓匹也。韓於書無所不讀，於道見其大原，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為文，以為本之易、詩、書、禮、春秋，參之穀梁、國語、孟、荀、莊、老、離騷、太史。其平生所讀書，止為作文用耳。」⁵⁴張伯行認為韓愈讀書見其道，子厚讀書只為作文，是以兩者文章天壤耳。茅坤也有對比韓、柳，以及兩家之讀書法「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為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沉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

55

⁵¹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7b。

⁵²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頁 2a。

⁵³ 「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鑿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為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干首以見其風概云」。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3-15。

⁵⁴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柳文引》，頁 8a。

⁵⁵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3-203。

至於文章風格上，茅坤云柳文「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這裡可以發現，茅坤對柳文之風格評價，與上面的「勁悍沅寥」都有一種險峻、奇特之感，非為尋常說法；是以茅坤評柳文一「奇」字！⁵⁶ 張伯行對柳文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只是用更多形象的說法，並以韓愈為比較：

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被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

韓如五岳、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嵋、天姥，孤峰矗雲，非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⁵⁷

張伯行對柳文之評價亦是「奇」，所用詞彙使人感到尖銳陡峭，反觀韓愈正正當當，頗有名山大岳風範。至此可知茅坤與張伯行對於柳文風格看法基本接近，只是張伯行特用「道」為標準去審查柳文內容，並認為「柳子所工者，文也；余所執以繩柳子者，道也。為柳子無見於道故不可，然道有離合，豈可因其文之工而掩之乎？」⁵⁸ 不論文章多麼工整，亦不能掩飾柳文不合道的缺點，這是張伯行特別強調，而茅坤所無也。

（三）歐陽修

茅坤看歐陽修，主要以史學精神為論，其云「至於歐陽公碑誌之文，可謂獨得史遷之髓矣」、⁵⁹ 「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公為最，何者？以其調自史遷出，一

⁵⁶ 「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為掩卷疊歎者。久之再覽〈鈞錫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203。

⁵⁷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柳文引》，頁8a-8b。

⁵⁸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頁8b。

⁵⁹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15。

切結構裁翦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予故往往心醉。」⁶⁰又云「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⁶¹從評論中可以看出，茅坤十分重視歐陽修之史學精神。

張伯行則重在論述歐陽修的為人，其云：

公博極群書，好學不倦；為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為；立朝侃侃，無所回撓。故其文如其人，及昌黎所謂「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者，豈可襲取而強為之哉？⁶²

公之文最長於論事，其所上札子，委曲暢切，得人臣納忠之道。序記文字，敷腴溫潤，令人喜悅。世之號為文章，非繁縟則淺陋，非庸腐則怪奇。⁶³

從粗體字的部分，可以看出張伯行十分讚揚歐陽修的人品，且稱讚歐陽修文如其人，這樣的評價其實承繼著儒學傳統而來，重視文字背後的人，而非文字本身。⁶⁴但張伯行亦對歐文風格作出評價，並完全認同朱熹觀點：

⁶⁰ 同前註。

⁶¹ 同前註，頁 1383-324。

⁶²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引》，頁 9a。

⁶³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引》，頁 9a-9b。

⁶⁴ 如《周易·繫辭下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魏·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宋·朱熹注：《周易二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 年），頁 526。

還有《孟子·萬章上》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以及《孟子·公孫丑上》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兩段分別引自宋·朱熹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 年），頁 428、頁 319。郭紹虞說這段「是儒家神的觀念之應用；聽其言，讀其文，因以窺其心，而之其人。」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頁 21。以上例子可以稍微說明，儒家歷來以人作為認識主體對象的傳統，

朱子曰：「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又稱其「平淡中卻自美麗，有不可及處」。讀公之文者，當以是說味之。⁶⁵

可以把朱熹的觀點直接看成是張伯行的，所謂「一唱三嘆」、「平淡中卻自美麗」是其評歐文要點；回觀茅坤，其云：「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⁶⁶又云「雖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態橫生，別為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予所以獨愛其文」，⁶⁷其云「可望而不可近者」、「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都與朱熹所謂「一唱三嘆」、「平淡中卻自美麗」若合符節，茅坤與朱熹對於歐陽公文章之審美把握相當接近。但茅坤更加著墨於這點上。繼而鋪張敘述之。與張伯行簡要帶過是不同的。

茅坤從《史記》評歐文與張伯行從「文如其人」評之，實際乃讚揚歐陽修人格修養；是以兩家雖都對歐文風格有一樣的體會，但茅坤重於文，張伯行重於人。

（四）王安石

王安石在八家中是比較特別的存在，因其在歷史上的特殊評價，導致選家在選編其文時，必有一套說詞，解釋選王文之原因，而茅坤對王安石之看法，並非完全否定，反而有點替他說話的味道：

八大家而下，予於本朝獨愛王文成公論學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等文，

文辭不過是工具，和輔助。

⁶⁵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引》，頁9b。

⁶⁶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324。

⁶⁷ 同前註。

程朱所欲為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⁶⁸所不逮也。即如瀨頭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況其設伏出奇，後先本末，多合兵法，人特以其稍屬矜功而往往口訾之耳。嗟乎！公固百世殊絕人物，區區文章之工與否，所不暇論，予特附揭於此以見我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後世之品文者，當自有定議云。⁶⁹

這段引文不僅認為王安石在某些文章上超過了程、朱，還有賢相陸贄、李綱，這無疑是對王安石的肯定與讚揚。且茅坤還認為王安石對兵法十分了解，真是一代人豪！又說他：

王荊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為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才。此所以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豐之間，刼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武丁之於傳說，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⁷⁰

茅坤說王安石本於六經之旨，又云有「王佐之才」，真是對他最大的肯定，甚至想平反歷代對王安石的負評。不過還是點出了王安石的缺點，認為「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徇於泥古為患，況以矯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拗之資，而恣之以私臆」。⁷¹

但張伯行就不那麼客氣了：

王介甫以學術壞天下，其文本不足傳。然介甫自是文章之雄，特其見處

⁶⁸ 李綱。

⁶⁹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16。

⁷⁰ 同前註，頁1384-1。

⁷¹ 同前註。

有偏，而又以其堅僻自用之意行之，故流禍至此；而其文之精妙，終不可沒也。當……其後用之而禍天下，世之君子嫉其人，而因以不重其文。使介甫不用以終其身，或用矣，而僅處以翰墨之職，使其以文章流傳於世，而不得大行其志，則介甫之名當益尊。至其以學術壞天下，故天下之不幸，而即介甫之不幸也。雖然，文也肖其人而出之者也。介甫文雖精妙，而其學術意見，隱然有倔強之意，形於筆墨間，固不待其用之後，而乃知其禍天下也。余特擇其文為世所傳誦者若干首評之，以質知言之君子。⁷²

張伯行對王的品性和政績持反對意見，以為其人和政事皆不可學，選他只是文章寫得好，並不是合於道。可是張伯行並不認為王安石有本於六藝之旨，更不用說合於古。選他的文章，甚至有警戒後人之意，由此看來，依然不是重在其文章筆法，乃是以道準繩王安石，和評論歐陽修文一樣，以人品會影響文章這個觀點去評論王安石文。這就與茅坤不同了，茅坤評論王安石的文風是用「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⁷³ 來評論，甚至認為「然較之曾，特屬伯仲，須讓歐一格。」⁷⁴ 王之文章與曾鞏伯仲之間，此乃茅、張二公在論八家上差別很大的地方。

（六）三蘇

三蘇中，茅坤對蘇軾文評價最高，其云「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僊軼世之才，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⁷⁵ 並哀憐

⁷²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王文引》，頁 12a-12b。

⁷³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4-1。

⁷⁴ 同前註。

⁷⁵ 同前註，頁 1384-396。

蘇軾為人遭遇。⁷⁶ 至於蘇洵，茅坤主要說他非純以六經作文，更難以《戰國策》、申、韓、荀卿文風，有「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⁷⁷ 而蘇軾亦受到了《戰國策》等縱橫家文風影響，故其文「直而鬯，而多疎逸適宕之勢」，⁷⁸ 形容其「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⁷⁹ 至於蘇轍，則與其父兄非常不同：

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道逸疎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棼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並席之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⁸⁰

雖然茅坤對蘇轍評語不多，但可以看出茅坤對蘇轍文的評價不低。

張伯行則不然，其對蘇氏父子的評價很低，並且合而論之；評文之觀點基本同於朱熹，⁸¹ 認為是「正大之旨難入，而巧辯之詞易好」，⁸² 「苟惟蘇氏之文是習，其不至惟心術之壞也幾希」，⁸³ 但張伯行還是選了三蘇文，其謂：「余選三蘇文，老泉聊存一二，東坡、子由亦擇其醇正者而錄之，其多從小處豈亦論者不錄。知道之士，必能是余去取之深意也。」⁸⁴ 依然以「道」為準則，去取三蘇之文。比較之下，張伯行並不認同茅坤對於三蘇之評價。

⁷⁶ 「然其以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4-396。

⁷⁷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 1384-302。

⁷⁸ 同前註，頁 1383-15。

⁷⁹ 同前註，頁 1383-16。

⁸⁰ 同前註，頁 1384-719。

⁸¹ 朱子自謂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讀此等文字。夫文字愈工，議論愈快，其移人愈速。朱子尚覺其如是，況乎？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三蘇文引》，頁 10a-10b。

⁸²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三蘇文引》，頁 10a。

⁸³ 同前註，頁 10b。

⁸⁴ 同前註。

大體來說，茅坤對八大家的看法，基本是韓愈、歐陽修為最，然後次之以柳、三蘇，再來是王安石、曾鞏，且王安石應是高於曾鞏的。可張伯行並不這麼認為，張伯行覺得韓愈、歐陽修、曾鞏是八大家之最，然後才是柳宗元、三蘇，最後是王安石。所以茅坤、張伯行，對於八大家最大之分歧，就在曾鞏、王安石與三蘇之優劣上，韓柳歐基本看法相近，只是所重不同；茅坤注重文章上的變化與氣勢，張伯行則注重在文如其人，文與道之關係上，或許這些都是張伯行重新選編八家文的原因，正要對茅坤看法做出修正與補充。

四、張伯行對於茅坤評語之補充與修正

張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其中不只有他的評語，還有茅坤、唐順之、王遵巖的評語，其實唐、王評語都是原於茅本而來的，張伯行只是直接將茅本所輯評語，再抄錄一遍，可以看作張本對茅本所繼承的部分。但張伯行並沒有抄錄全部的評語，有些條目張伯行只錄自己的評語，而忽略了——或是準確地說刪去了——茅本的評語。那麼刪去這些評語的原因為何，就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另外，還有一些篇章，若仔細看茅坤與張伯行對其評語，會發現張伯行與茅坤意見相左。本章討論張伯行與茅坤評語之補充與修正，其實就是希望透過比對兩家之評語，整理張伯行與茅坤評語不同之處，並且討論這兩者不同之意義與內涵。而筆者整理出三種類型，去討論兩家評語，分別是：（一）所重各異（二）發揮前說（三）修正前說；張伯行與茅坤評語之關係大致不出這三項，以下筆者將分項進行討論：

（一）所重各異

所重各異，意思就是兩家對於同一篇文章評語不同，卻無相互乖違，而是對

於文章本身，所注重的內容與討論重點都不盡相同。是以筆者所舉之例，以能突顯兩家評文特色例子為主，冀使讀者明白兩家差異何在？又因何而致此差異？

舉例說明：

茅鹿門曰：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

張孝先曰：大丈夫處世非行則藏，豈可不顧廉恥以求富貴？縱使求之而得，已可羞矣，況未必得耶？何如潔身歸隱之為高也。借題寫意，警人憤憤。⁸⁵（〈送李愿歸盤谷序〉評語）

茅鹿門曰：此文雅致。

張孝先曰：書記之任至重，非有才不足以居之；而書記之才與否又視其帥何如。天下之才人固非庸眼所能物色也。推之用人取友。莫不皆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故蓋微矣哉。⁸⁶（〈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評語）

茅鹿門曰：子厚之文，多峻峭鑿巖，而骨理特深。

張孝先曰：材良喻質，器攻喻學。方其中所以載，圓其外所以行，此車之大體也。而眾車既非一類，即一車之中，而又析之各有其具，猶士之通方具宜，而用無不周也。總以方中圓外為主。體物既精而文詞峭健，類《考工記》。⁸⁷（〈說車贈楊誨之〉評語）

從〈送李愿歸盤谷序〉之評語，可以發現茅坤所注重的點在於此文章之「造語形容」處，反觀張伯行卻重在大丈夫處世應當如何；〈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

⁸⁵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2，頁19a-19b。

⁸⁶ 同前註，卷2，頁23a-23b。

⁸⁷ 同前註，卷4，頁28b。

記〉評語亦是如此，茅坤只簡單評了「此文雅致」，張伯行卻大發胸中意見，認為書記之才應有一定程度，並推及求賢交友之道。而〈說車贈楊誨之〉這篇評語，茅坤專在評論柳文如何刻劃，張雖也云其「文詞峭健」，然重點卻在前段以車之形制，發明理想士大夫之人格特質，所重之點不同如此。至如〈五代史宦者傳論〉茅坤評語「其機圓，其情鬯」，⁸⁸ 張伯行則云「《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以近習之人而忽之，所謂辨之不早辨也。」⁸⁹ 張伯行引用《易》卦來解釋此文，更引伸至哲理論述；茅坤卻只云此文之妙和其中情感而已；又如〈荀卿論〉茅坤評云：「以其所傳攻其所蔽，荀卿當深服」，⁹⁰ 張云：「論李斯之禍，自荀卿開之，似乎深文。蓋折以孔孟平正無弊之道，則荀卿之高談異論，其貽禍自有必然者。可謂透切事情而不詭於理矣」，⁹¹ 茅以議論文之寫法來評，張則以「不詭於理」論此文章；又〈文與可畫篋簞谷偃竹記〉茅坤以為「中多詼諧之言，而論畫竹入解。」⁹² 而張伯行特以為「坡公為文隨手寫出，觸處天機，蓋是心手相得之候，無意成文而文愈佳也。余獨愛其論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不可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甚有妙理，可以旁通。」⁹³ 茅坤從文章本身之藝術特色去評論，張伯行則以蘇軾論竹，去討論物皆有其妙理可以旁通，展現張評文目的正在「格物致知」上。

由上面之比較，筆者認為茅評論多在文章風格與技巧表述，雖亦有云文章內容的部分，但是相對張伯行卻少得多；反觀張伯行，則重在對文章內容的闡發，甚至很多時候會借題發揮，闡發自己對於政治、士君子之人格、還有道德上面的理想。這是張本很有特色，很有意思的地方。可以看出，茅與張在評文上有

⁸⁸ 同前註，卷5，頁33b。

⁸⁹ 同前註，卷5，頁33b-34a。

⁹⁰ 同前註，卷8，頁13a。

⁹¹ 同前註，卷8，頁13a-13b。

⁹² 同前註，卷8，頁32a。

⁹³ 同前註。

很大不同，原因是茅有很明確之企圖想點出作文之法；而張伯行是從格物窮理、君子之志、政治制度這幾點去看文章，是以兩者所觀如是不同且偏好各異。

（二）發揮前說

此節討論當茅坤與張伯行在評語上看法相近時，張伯行會再將茅評補充，甚至擴大其說法，例如〈愚溪詩序〉之評文與〈陪永州崔使君游讌南池序〉：

茅鹿門曰：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為之，指次如畫。

又曰：子厚集中最佳處。⁹⁴

張孝先曰：獨闢幽境，文與趣會。王摩詰詩中有畫，對之可當臥遊。⁹⁵

茅鹿門曰：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

張孝先曰：寫景物之勝、讌遊之樂，而末及自發其悲感無聊之況。子厚工於文而無見乎道，內既無所得乎己，而外未免移乎物。是以當歡而悲，情詞局促如此。此君子所以貴乎知命而樂天也。⁹⁶

此二段評語，皆明顯表現出張對於茅評語的申論，在〈愚溪詩序〉的評語中，茅坤只云「指次如畫」，但張更云「獨闢幽境，文與趣會。」可見茅坤所云的如畫，就如張伯行所云是柳宗元「獨闢幽境」，有一種形容如畫的體驗；張伯行還舉王維之詩說明「王摩詰詩中有畫，對之可當臥遊」，正為解釋「如畫」的概念，雖然張伯行的解釋並不盡如人意，卻可看出張在茅評語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去闡發說明。

從〈陪永州崔使君游讌南池序〉的評語中，茅云「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

⁹⁴ 同前註，卷4，頁17a。

⁹⁵ 同前註，卷4，頁17a-17b。

⁹⁶ 同前註，卷4，頁18a。

云」，簡單的一句評語，張伯行卻試著說明柳宗元為何會有這樣的抑鬱之思，乃因「子厚工於文而無見乎道，內既無所得乎己，而外未免移乎物」，這樣的原因與張理學家的身分固然有關，然此處是張伯行在同意茅坤評語的基礎上，去闡發他自己的看法。這種對茅坤評語的補充，並不是偶然的，張伯行事實上是很自覺地在做這樣的補充；從〈醉翁亭記〉的評語中可以說明：

茅鹿門曰：文中之畫。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才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張孝先曰：文之妙，鹿門評鑒之。朱子言歐公文字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見文字最要修改，故附錄之。⁹⁷

張在此篇文後的講評，特別提到「文之妙，鹿門評鑒之」，就是說茅已講了為文之妙，所以張伯行後面不講為文之妙，而講歐陽修何以有此妙文，就在「文字最要修改」六字。由此條材料可知，張伯行對於自己補充茅坤評語的行為上是自覺的，這樣更可以證明張伯行確實想要對茅坤的評語加以補充，甚至要評得更好。

（三）修正前說

此節次要討論張伯行不同意茅坤評語處，及張伯行將茅坤評語刪去的部分，並討論兩家評語不同之原因，推測張伯行不收茅坤評語之因由。

首先討論一下幾個刪去茅坤評語的例子：

茅坤曰：中多自悲并以自譽。⁹⁸

張孝先曰：韓公生平實歷見於此書。學問底蘊，固未易測其涯涘。其曰：

⁹⁷ 同前註，卷6，頁17a。

⁹⁸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37。

「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其精細有實用處，學者當玩味於斯言。⁹⁹（〈上兵部李侍郎書〉評語）

茅坤曰：昌黎公遇而不遇，其書如此。¹⁰⁰

張孝先曰：公受知於崔虞部，而其志則與競仕進者不同，故自述其進學之切如此。「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噫，此士之所以貴自立也！眼前之窮約，何足為之介意哉？¹⁰¹（〈上考功崔虞部書〉評語）

唐順之曰：此亦變體，李觀本文士而又為韓公之友，不知發之何以如此其略也。

茅坤曰：誌特謹書官爵及死葬月日，而行誼則蘊藉銘中。¹⁰²

張孝先曰：元賓為公心友，而志之如其略，何也？但悲其天，而有不朽者存，則孰謂之夭耶？「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其實錄不過十一字，使人想像其心胃面目於千百載之下。公之傳元賓者，止此足矣。豈若後世諛墓之辭，累數千言而未已者耶？¹⁰³（〈李元賓墓銘〉評語）

在〈上兵部李侍郎書〉的評語中，茅坤認為韓愈在這篇文章展現出「自悲自譽」的心態，但張伯行卻不予收錄，而完全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評這篇文章，並且說「其精細有實用處，學者當玩味於斯言」，他希望讀者看到的是「實用之處」——就是韓愈文章內容：「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這四句。從張伯行刪去茅坤評語的事實看，茅坤所謂「自悲自譽」的心態，是張

⁹⁹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1，頁13a。

¹⁰⁰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43。

¹⁰¹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1，頁15a。

¹⁰²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383-178。

¹⁰³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3，頁31b。

伯行所不認同，並覺得無用於讀者的話。

看〈上考功崔虞部書〉的評語，茅坤認為韓愈是因為「遇而不遇」才会有這麼激憤的言詞；但張伯行則以為韓愈表現了一個士人該有之志節，是「此士之所以貴自立也！」因此張伯行在刪除茅坤評語時，大概覺得茅評不值參考，從張伯行贊同韓愈此篇文字可知；茅坤與其相反的言論，並以為韓愈有發牢騷的看法，促使了張伯行刪去其評語。

〈李元賓墓銘〉一篇，唐順之覺得「不知發之何以如此其略也」，韓愈記錄得太省略了，茅坤也這麼覺得，但是茅坤認為韓愈是把事跡都寫在銘，所以誌文就較省略。可張伯行認為「其實錄不過十一字，使人想像其心胷面目於千百載之下。公之傳元賓者，止此足矣。豈若後世諛墓之辭，累數千言而未已者耶？」正是回應唐順之與茅坤的評語，張伯行覺得若能傳形肖貌，其實只需要幾個字就好，不若後世寫一大堆阿諛文字，其實都不屬實，也沒辦法傳之久遠。由此，可知張伯行刪去茅坤評語，正是覺得茅坤評語不值得參考。

以上是張伯行刪去茅坤評語的例子，另外還有評語是茅坤與張伯行互相對立，甚至有些評語可以看做張伯行與茅坤對話。

〈送石處士序〉，這篇序文茅坤並不買帳，認為「當是韓之變調，然予獨不甚喜此文」，¹⁰⁴ 但張伯行卻相當讚賞此篇，以為「此作序之大旨，妙在盡托他人之言，使觀者渾然不覺，而深味無窮。」¹⁰⁵ 張伯行雖無直接反對茅坤評語，但實際上卻與茅坤的看法大不相同，而張伯行讚賞的点正在韓愈勸石處士不要為了利益而拋棄為士的氣節。¹⁰⁶ 至於〈圻者王承福傳〉，則是明顯反對茅坤之言，茅坤認為此文「以議論行敘事，然非韓文之佳者」¹⁰⁷，張伯行不同意這個看法，

¹⁰⁴ 同前註，卷2，頁12b。

¹⁰⁵ 同前註，卷2，頁12b-13a。

¹⁰⁶ 同前註。

¹⁰⁷ 同前註，卷2，頁25a。

他認為：

人生天地間，任有大小，功有勞逸，斷無食焉而怠其事之理。世之貪冒富貴者，不度德量力，而苟焉居之，多行可愧，自謂無患，而不知殃禍之隨其後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聖人之垂戒天下後世如此，而人不悟，何也？公見當時此等輩甚多，故借巧者目中口中寫出盈虛消息道理，真如清夜鐘聲，令人警省。通篇抑揚錯落，盡文字之趣。謂非韓文之佳，似未深知文者也。¹⁰⁸

張伯行從深誠士大夫這個面向，去談韓文此篇佳者，以為如警醒人之清鐘，甚至批評茅是「似未深知文者也」，對立批評意味非常濃厚。可看出茅坤代表之古文家，與張伯行所代表的理學家，兩家在看文時表現之興趣取向不同。再者，如〈送徐無黨南歸序〉，茅坤以為「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為深省」，¹⁰⁹ 張伯行也認同茅公，以為「歐公此文，蓋悲文章言語之無用，而慨學者勤一世以盡心於此者為可惜也。」¹¹⁰ 可張伯行認為為文並沒有錯，重點在於為文章之內容，如果學者能如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等聖賢，為立言不朽文字，那麼，寫這樣的文是沒問題的。¹¹¹ 由此，更可看出張伯行不同於茅坤之處。而如〈熙寧轉對疏〉的評語差異，就是承繼著兩個人對曾鞏不同之看法，所以有不同的評論，¹¹² 說到底，竟是重文還是重道使然。

¹⁰⁸ 同前註，卷 2，頁 25a-25b。

¹⁰⁹ 同前註，卷 6，頁 6a。

¹¹⁰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 6，頁 6a-6b。

¹¹¹ 同前註。

¹¹² 茅坤曰：「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於時。姑錄而存之，以見公之槩。」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 11，頁 6a。張伯行曰：「通篇大要在得之於心，致其知以盡天下之理而已。文字層層脫換，步步

論述至此，需要對本篇論文問題做一回顧。首先是張本對茅本取代的問題，其實任何一本新的八大家選本，其原因都是覺得現有版本不好，才要重新編選一本。¹¹³ 而目的與需求則見仁見智，有時更因時代思潮、需求而變化。

至於張本的出現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其所代表的意義，又是如何的呢？如果從時代背景來看，明末清初所產生的實學思潮¹¹⁴ 以及康熙時代對於程朱理學的發揚，¹¹⁵ 都對張本產生影響。環境對八大家選本產生的影響可從此看出一

迴環，如川增雲升，多少奇觀！而尋其關鍵，只是一線到底耳。朱子言南豐文字峻潔有法度，當於此觀之。其引經術，直是西漢文氣味，韓、歐集中俱未有也。特其說到為學工夫，終少把柄，與程、朱論學又隔一重。故欲求聖賢之學，必自程、朱之緒言入，方有實地可依據。」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 11，頁 6a-6b。

¹¹³ 付瓊對此有精闢論述：「明清學人對茅《抄》的負面評價，也應作如是觀。在此起伏的負面評價聲中，不滿茅《抄》的人們不斷對它加以改編或再選，以適應不同時代、不同群體的不同需要。每一個新選本都在揚棄茅《抄》的基礎上有所變革，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因襲了茅《抄》的基本特徵，這個基於共同母本、有因有變的衍生過程就是唐宋八大家選本的再生產過程。」

又云「如果茅《抄》被公認為適用於所有人群、所有時代的最佳舉業讀本，那麼對它加以改編和再選就失去了必要。正因為人們對於它的種種不滿，才產生了這些種類繁多的新選本。就此而言，明清學人對茅《抄》的負面評價與科舉力量一道，從不同側面共同推動了唐宋八大家選本的再生產。」付瓊：〈簡論明清學人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負面評價〉，頁 133。

誠然，如果有一本符合大家要求的選本誕生，就不會產生如此多的選本，是以張本的出現，也是針對茅本而修改，並希望能取代之的。

¹¹⁴ 戴葉云：「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面對『天崩地解』的時局，就如何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經過深刻的理性反思，普遍地主張黜虛務實，提倡經世致用，由此形成了一股積極進取，充滿活力，適應時代要求，廣泛滲透于自然、社會、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新的思潮——『實學思潮』。」

又云「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首先是對理學與心學的經世傳統及其實學思想因素的繼承和發揚。理學與心學雖然都著力於發揚孟子的『內聖』路線，將追求宇宙本體和追求個人心性修養的完善作為治學的根本宗旨，但是，他們並未完全拋棄儒家的經世傳統，如前所述，在其論著中也包含有某些實學思想因素，特別是程朱理學中包含有較多的實學思想因素，明清時期的實學思想家們對之多所肯定。」戴葉：《論明清之際實學思潮中的經世思想》（江蘇：蘇州大學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5。

¹¹⁵ 「大約經歷 40 多年的時間，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西南農民軍聯明抗清鬥爭以

二，而張本在清代原不熱門，至現代反受注目，並有出版社整理出版，這其中原因值得深思。也就是說，八大家選本在編選上受到時代潮流影響，然不是每種選本都受重視，其中編選理念和流程度，是否如學者所云受到舉業教育之影響而已？又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凡此種種，皆此篇未及，尚待博雅君子予以闡明。

五、結語

筆者試著從兩選本的編選理念與體例、對八大家的看法、評語之不同上，去看張伯行對茅坤選本的繼承與刪改。

在編選理念與體例上，張伯行對茅坤的篇章與體例基本相同，篇章的順序與茅坤大致不差，雖沒有嚴格的文體分類，卻依照茅坤的文體順序排列。兩家都有〈原敘〉、和〈八家引言〉，只是茅坤多了〈八家論例〉，張伯行多收了羅倫的〈元豐類稿·敘〉；此外張伯行特別收了茅坤的〈曾文定公文鈔引〉，可見對曾鞏之重視。而在兩家選文之標準與目的上，茅坤的標準以及論文之總綱領，就是「其旨遠，其辭文」，並且只要符合這兩個要求，文與道是不分的。而在茅坤看來，文章之文采，正是道所展現之燦爛光輝。張伯行則認為寫文章是為了立言不朽，文章之本在於六經，六經乃治世之文，故張伯行對於文章的標準不只在於

失敗告終，臺灣孤島抗清據點最後傾覆，民族矛盾因而隨之緩和，清政府對北方和中原的統治力量相繼加強。擺在清統治者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挽回明末清初這一段時間內社會秩序崩潰、政治紛亂、人心渙散、士風敗壞、上下爭權奪利的腐朽不堪局面。清初把問題歸咎於明季姚江王陽明（守仁）致良知之說，造成一般士子倡狂自肆，如狂禪一派，以至於『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是黃、顧、陸輩直以明之亡，亡于王氏之理學也。」王鍾翰：〈康熙與理學〉，《歷史研究》第3期（1994年6月），頁116-117。筆者案：文中所云有關抗清鬥爭等立場，乃因於作者時代思想背景影響，然此段後半所云大清帝國為尋求一穩定統治手段，乃是事實，讀者察之。

六經，更需要有積極的治世之用。而對於古文的看法，茅坤認為文與道是並重的，張伯行則以為「文者道之枝葉」。目的上，茅坤是為了宣揚唐宋古文之文學觀點，並且讓考科舉的士子可以有作文之範本學習；張伯行雖然亦有教學子之目的，然其重點是在「格物致知」以窮理上。

對八大家之看法，兩家差異大體來說，茅坤對八大家的看法，基本是韓愈、歐陽修為最，然後次之以柳、三蘇，再來才是王安石、曾鞏，並且王安石應該是高於曾鞏的。可是張伯行並不這麼認為，張伯行覺得韓愈、歐陽修、曾鞏是八大家之最，然後才是柳宗元、三蘇，最後是王安石。所以茅坤、張伯行，對於八大家最大分歧之看法，就在曾鞏、王安石與三蘇之優劣上，韓柳歐基本看法相近，只是所注重之地方不同；茅坤注重文章上的變化氣勢文風，張伯行則注重在文如其人，文與道之關係上，或許這些都是張伯行重新編選八家文的原因，正是要對茅坤之看法做出修正與補充。

至於兩家評語之比較上，筆者整理了三種類型，去討論兩家評語，分別是：（一）所重各異（二）發揮前說（三）修正前說。這三個部份分別表現張伯行對於茅坤評語的繼承與刪改，在（一）所重各異這項，突顯了茅坤作為古文家與張伯行作為理學家及政治家，兩者所關心和注重的地方不同。茅坤評論多在文章風格與技巧表述，雖有云文章內容的部分，但相對張伯行卻少得多；反觀張伯行，則重在對文章內容的闡發，甚至很多時候會借題發揮，闡發自己對於政治、士君子之人格、還有道德上面的理想。（二）發揮前說，則是張伯行繼承茅坤評語之處，並且也展現出了張伯行取代茅坤評本的企圖心。（三）修正前說，是張伯行對茅坤評語之刪改處，有些地方刪去了原本茅評的部分，就是張伯行不贊同茅評之處；而一些沒有刪去的評語，也可看到張伯行對於茅坤評語的不認同，以及修正前說之意思。

總的來說，張伯行不論在體例與理念上、對八大家的看法上、以至於對篇章

的評語上，都與茅坤有不同之處，而究其原因，則是兩人對於文與道的看法不同，茅坤重於古文本身書寫之風格技巧，組織結構，更傾向於科舉實用性而評文。張伯行則重在對「道」的認識，古文只是認識道的一種方式，將古文寫得好並非是目的，「見道」才是，這樣一種格物致知，以窮事物之理的態度，造成兩個選家選本各方面之極大差異；也可確定，張伯行之所以再編選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鈔》，是想要超越，並取代茅坤版《唐宋八大家文鈔》的。而其原因除了選家的觀點外，亦包含時代因素所造成的影響。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魏·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宋·朱熹注：《周易二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年。
- 宋·朱熹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年。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明·王慎中：《遵巖集》，CADAL 掃描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43年[1778]刊本。
-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四庫文學總集選刊影印欽定《四庫全書》本。
- 明·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CADAL 掃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重刊，明·萬曆刻本，約西元16世紀。
- 明·唐順之：《重刊荊川先生文集》，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掃描《四部叢刊初編》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萬曆元年[1573]重刊本。
-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正誼堂全書》影印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
- 清·張伯行選錄：《二程語錄》，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正誼堂全書》影印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
- 清·張伯行：《正誼堂文集》，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正誼堂全書》影印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
- 清·張伯行：《正誼堂續集》，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正誼堂全書》影印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清·康熙間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約1705年。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一版。

陳榮捷著：《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吳惠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3年初版。

吳小林：《唐宋八大家》，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初版。

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選本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二）期刊論文

王鍾翰：〈康熙與理學〉，《歷史研究》第3期，1994年6月，頁116-117。

付瓊：〈唐宋八大家選本在明清時期的衍生和流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8年7月，頁90-91。

——：〈唐宋八大家選本與明清文學教育的適配〉，《天府新論》第5期，2008年9月，頁142。

——：〈唐宋八大家選本群的歷史分期〉，《學術論壇》第8期，2012年8月，頁80-82。

——：〈簡論明清學人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負面評價〉，《文學評論》第6期，2012年11月，頁126-133。

蕭瑞峰：〈張伯行與《唐宋八大家文鈔》〉，《古典文學知識》第4期，1995年7月，頁99。

（三）學位論文

張江潘：《張伯行經世實學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所碩士論文，2010年。

戴葉：《論明清之際實學思潮中的經世思想》，江蘇：蘇州大學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